

# 当代在美华文作家文化认同的嬗变

## ——以白先勇小说《孽子》为例

李谷雨

云南大学

**[摘要]**白先勇的小说《孽子》看似是在叙述一群青少年的经历，实际却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意义，代表的是孤独中对中国文化的归属和认同。白先勇的其他作品也体现了作者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在跨文化的过程中，作者的文化认同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过程中虽经历了文化孤独，最终却形成了文化认同和归属。

**[关键词]**白先勇；《孽子》；华裔美国文学；文化认同

**[DOI]** 10.12252/j.issn.2096-6261.2021.08.1766

### 一、从《孽子》透视白先勇的文化孤独

《孽子》中的主要人物，根据白先勇在卷首语中对他们的描述，是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独自彷徨街头，无所归依的孩子们”<sup>[1]</sup>。他们心中充满不被家庭和社会接纳的孤独感。第一部放逐仅有两段，交代父亲愤怒地将李青逐出家门，以及学校给李青的退学通告。第二部都在叙述以李青为首的青少年的家庭以及青少年游离于家庭之外的生活。

因为家庭破碎，这群青少年在家庭之外的地方寻求温暖。至于这样的尝试是否能够成功，作者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从已经发展完整的情节来看，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小弟因为打伤丽娜的幼子而被送去警察局，李青寻找无果。因为林茂雄家人的反对，林茂雄无法带小玉去东京。吴敏的一片真心没有得到张先生的善待，反而经常遭到训斥。他们的种种努力并未使创伤愈合，反而加深了孤独。

事实上，在《孽子》中，白先勇并非只是在书写青少年的归属和认同。“孤儿孽子原都只是现实家庭中失怙失爱之子辈的通名，在此转为国族认同与原乡追寻时无所依归者的总体喻称。”<sup>[2]</sup>强烈的孤儿孽子情结背后是大陆迁台人士的共同心理。书中个人的经历与社会的历史交织，揭示出背后20世纪50年代对祖国的思念是普遍突出的现实问题。

### 二、从《孽子》透视白先勇的中国文化认同

尽管通篇弥漫着孤独感，《孽子》却蕴含着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这种认同体现在小说中青少年的行为和思想两个方面。

从行为上看，小说中青少年的行为选择符合中国文化的标准。孝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子道要求子女对父辈要敬、孝、不违、劳而无怨”<sup>[3]</sup>。儒家思想强调子女对父母的爱和服从，在书中的青少年的行为中有所体现。吴敏的母亲怀孕时父亲入狱，吴敏在二叔家出生，小时和父亲很陌生。吴敏的父亲不是在监狱，就是带着他流浪，因为经常欠租，多次被房东撵出门。吴敏却给出狱的父亲买各种生活用品，嘱咐父亲生活的细节。吴敏侍奉长辈张先生也是尽心竭力，张先生中风后，吴敏从餐厅下班后每天去医院服侍，面对他人的劝阻和不解也毫不动摇。小玉和母亲相依为命，从小就对母亲说要帮她把父亲找回来，去各个观光旅馆查日本旅客名单，在信中也忘嘱咐李青帮忙给他母亲买她喜欢的鸭饼。李青的母亲偏爱李青的弟弟并嫌恶李青，李青仍按照母亲的遗愿将她的骨灰带回家，并承担照顾弟弟的责任。

从思想上看，小说中的青少年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对家的眷恋。其一是对家庭和和家人本身的眷恋。“我”不被父母疼爱，被父亲逐出家门，却仍然“不禁想起我们那个七零八落、破败不堪的家来”<sup>[4]</sup>；小玉总在猜测父亲的去处，幻想父亲突然发迹从日本回国，把自己和母亲接到东京。其二，作者还通过青少年对与家人相似的他人的眷恋，反映青少年对家人的眷恋之深。李青把智力有问题的孩子“小弟”带

回家，给他吃鲜奶和芒果，给他洗澡；吴敏执意照顾与父亲年龄相仿、性格相似的张先生，是为了寻得家庭归属感。李青与小弟、吴敏与张先生本是萍水相逢，前者对后者产生好感、愿意为之付出，不过是因为他们与自己的家人相似，侧面反映了青少年对家人的情感。

### 三、从其他作品透视白先勇的文化认同

白先勇是将领白崇禧之子，出身于显贵的中国家庭，从自身的经历中切身地感受到这一代“自愿放逐”的“漂流的中国人”失根的无奈和复杂的心境。<sup>[5]</sup>尽管受美国文化影响的时间更长，白先勇却对中国传统文化尤为关注。童年和少年时代，他阅读了大量中国典籍，“小学五年级便开始看《红楼梦》，以至于今，床头摆的仍是这部小说”<sup>[6]</sup>。他还从事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致力于传承昆曲，并在中文大学举办《红楼梦》的公开主题讲座。

白先勇的小说有两个特征，其一是人物对归属感的渴望。除了《孽子》，短篇小说《寂寞的十七岁》也体现了这一特征。杨云峰不如兄弟优秀，却更渴望获得父母的认同，给自己寄邮件、拨空号等怪异行为是为求得关注。其二是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包括作者本人的文化认同（“谪仙怨”“谪仙记”的标题具有浓郁中国风格，“金大奶奶”“我们看菊花去”取材自早年的国内生活经历）和作品中人物的文化认同（如“芝加哥之死”中吴汉魂无法融入芝加哥的灯红酒绿、始终牵挂着国内亡母）。

同时，过去和现在的关系也融合在身份认同中。“台北只是他们人生失落之后客居的‘梢’，大陆才是他们生命生长的‘根’。而遗憾的是，仅仅作为生命寄寓的‘梢’，却是他们眼前的现实，而作为他们生命的‘根’的大陆，却又成为往昔的记忆和‘明天’的梦。”<sup>[6]</sup>白先勇笔下的人物无法割舍对过去的执念。现在常是过去的投影：如《梁父吟》以诸葛亮影射王孟养，《秋思》以华夫人象征“中华”。而他们的过去关涉的正是故乡、亲人。追忆过去仍归结到怀念家园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1]白先勇.孽子[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 [2]梅家玲.孤儿?孽子?野孩子?——战后台湾小说中的父子家国及其裂变[J].文艺争鸣,2012(6),14-26.
- [3]林存阳.中国之伦理精神[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233.
- [4]刘登翰,庄明莹.台湾文学史(第二册)[M].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2007,478.
- [5]刘登翰.遥望那一树缤纷:台湾文学漫论[M].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7,299.

基金项目: 课题项目: 本文为云南大学2020年度国家级创新训练项目“跨文化视角下当代在美华文作家作品中的文化认同研究”(202010673044)成果。